

外国妇女丛书

为自由而生

——美国妇女历史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萨拉·M·埃文斯 著 主译 杨俊峰 主校 杨俊峰

美洲的第一代女性
来到北美的妇女
“我与政治有何相干”
妇女与现代化进程
摩登女郎、
弗洛伊德学说和爵士乐
幸免于经济大萧条
冷战与“女人的奥秘”
个人生活的政治化



外国妇女丛书

总策划：李英健

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萨拉·M. 埃文斯 著

Sara M. Evans

Copyright © 1989 by Sara M. Evan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ENSA 150 13
111

前 言

在过去的 20 年中，美国妇女的地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政府、劳动力、大众文化——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她们对自己的潜力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一重要变化激励我们重新审视妇女们所学的历史。妇女很了解自己的过去，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无法展望自己的未来。然而，能够得到的有关历史资料，仅仅是对妇女参政主义积极分子或有传奇色彩但并不重要的人物的简单介绍，如贝特西·罗斯。多数妇女对历史上女性的经历了解甚少，对有关妇女的话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们只是旁观者。她们想了解的历史现正在大量挖掘出来。~~对美国妇女来说~~，现在是全面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好时机。~~在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重述妇女历史，~~探讨妇女的成就和苦难~~，把妇女历史融进整个民族历史。

历史学家对妇女的历史地位避而不谈并不是因为疏忽。当历史被看作是对国家（主要是政治上的）行动的叙述时，它的发生地就是舞台，而传统上是把妇女排斥在舞台以外。这种对妇女排斥的思想意识又派生出双重标准；尽管妇女在政治上十分重要，但仍然没有受到重视。在过去的 20 年中，通过对妇女、黑人、家庭生活、工厂工人以及移民的经历的研究与探讨，一项令人吃惊的多元论思想被引入了传统历

史。现在我们有不同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所有不同人的经历融进美国历史的主流，写出一部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国家历史。

许多人认为，这种集众家观点于一体的历史叙述方法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独到之处。这种做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公益高于私利，人们充分信任主权是民众的、公民是积极的“有道德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民众主权、公民道德以及个人自主权这些字眼都源于英国政治历史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在对美国独立问题进行辩论的过程中，这些词汇被带进美国人的生活，并被美国人所接受，但接受的方式却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美国社会的多元性需要对共和政策进行补充，并使其适应新的形式和体制。古典的共和政体早已和福音派新教制度以及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自由主义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活跃型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独特的固有的成分与西欧传统融为一体。

围绕美国独立战争而进行的辩论，按照古希腊人的臆说，是把社会场所和家庭范围一分为二，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哲学家汉纳·阿伦特认为，社会场所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是独立的公民和家庭以同等身份集合在一起议论社会前景的地方，是得到充分自由的场所，是人们说服听众，使自己的成就得到公认的地方。同时，对一个活跃的充满生机的“社会场所”来说，它必须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而家庭范围所关心的不是建立共同的世界之类的问题，而是维持生活、满足基本需要和人类生存（生产食品和繁殖后代）。正因为妇女和奴隶一心一意满足生活需要，家里的男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外出从事政治活

动。政治哲学家吉恩·伯斯克·埃尔斯坦认为：“家庭就像一枚硬币，它有两面，正面是热心公益的男性公民和忠于职守的父亲，背面是慈祥、有德、贞节和无私的妻子……。没有人在家烧火做饭，立法大厅里就会鸦雀无声，空无一人，或者会变得尔虞我诈。”

虽然政治活动和公民权利在社会场所有特定的含义，但没有介入社会场所的美国妇女却非常有效地重新划分了那个场所的界限，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个新界限进行探讨。通过重新划分界限，她们改变了社会生活本身的意义，这是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才做到的。与此同时，她们还一边建立家庭，一边使家庭跟上变革的时代。她们见缝插针，通过在社会场所开辟新的空间——在政治与工作之间，工作与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成立自愿参加的各种协会——她们对公民身份产生了新看法，而不是过去农民和手工业者狭隘的看法。妇女的洞察力是我们国家独特的民主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美国妇女奋斗的历史中充满了讽刺，她们为了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从未间断过斗争。这使我们不得不好好地反思，在过去的4个世纪里，一直没有给“社会”、“家庭”、“男性”、“女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例如，在殖民主义时期，大西洋沿岸的一片片殖民地纷纷出现了乡镇会议和殖民地集会，参与性的社会生活也开始出现，人民实行自治。那时，含义面狭窄、不允许妇女介入的“社会场所”与家庭范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17世纪的现实生活中，分给家庭许多任务和责任，如：教育、商务活动、保健以及福利之类的工作，现在这些工作都归口于社会和有关机构。结果，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个人感情色彩浓厚，颇像家族关

系，而不像 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那样，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这是因为在小规模的居民区里，人们都相互认识和了解。例如，向你出售兽皮的鞣皮工很可能是个远亲、邻居、长老或议院成员。因此，尽管妇女没有正式的社会角色，但她们可以对家庭成员施加影响，从而对社会活动进行控制。最有力的证例是易洛魁妇女，她们有别于殖民时期其他部落的女性，家庭主妇作为一个群体可以对长老会成员进行提名并对首领的委派加以否决。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市妇女的行动是最极端的一个范例：那些作为被告的巫女、原告和见证人连续数月吸引着整个殖民地的注意力。

美国独立战争为家庭生活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新的政治秩序把妇女地位提到社会问题的高度，至今仍然是这样。社会生活是“自由”的形态领域，是使成就和优点得到承认的场所。19 世纪，这一领域向四周又有所扩大，被排斥在外的妇女对此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她们开辟了不同形式的社会生活领域。可以说每一个妇女群体——中产阶级、移民、黑人、工人阶级——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自发地联合起来表述她们的利益，并组织社会活动，使她们有机会公开谈论与男人以及社会名流们观点相悖的家庭和道德问题，同时也给某些道德价值，如怜悯和公平，赋予了政治力量，这种道德价值准则正在从主流政治文化中慢慢消失。

在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从最初的妇女当助手的家庭经济时期到独立战争和共和制形成时期，从妇女倡导改革的 19 世纪到为明确和确定妇女地位和男女平等的意义而进行奋斗的今天，美国妇女从未停止过对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界限提出挑战，并对此界限进行不断调整。她们强烈要求全社会对起源于家庭范围的问题给予关注并采取行动，如保健、

教育和贫困等问题。她们为了在家庭以外挣得一点工钱，曾经到社会上去工作，尽管到了19世纪挣工资已经成为从文化上界定“社会”和“男子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妇女开辟了女性职业如教学、护理和社会福利工作，把起源于家庭的许多角色社会化。就是在杰斐逊所创立的使美国公民成为独立的有道德的自由民的美国梦遭到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破坏时，她们创造了独特的美国式社会生活方式，通过自发的联合使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观点得到立足。

我们不能低估她们的功绩，因为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公的赤裸裸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要为实现美国民主梦继续奋斗。自19世纪初，男女自发的联合组织就是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这些组织，妇女把原本由家庭处理的问题交给社会处理，敦促对国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但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原来由家庭承担的责任现在由国家福利机构承担，这同时缩小了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而且常常是强迫性的、不讲情面的。然而，自发地进行组织活动是美国妇女再次激发人们参与意识的法宝，也是被排斥在美国生活主流以外的社会群体的法宝。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但这么做的结果却使传统上把妇女归属于家庭的，矛盾更加突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会弄清楚不让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对妇女本身和对社会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这个问题的性质尚未有人去研究，但部分原因是女权运动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没有正视社会生活的特定性质和公民的意义。女历史学家把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研究妇女界的规模上——做了哪些工作、建立了哪些组织、改变了多少人的有关性别的思想意识。除了个别情况之外，这些历史学家都避

071960

开了对政治的研究，接受了政治属于男人的文化划分，或是把妇女的政治行动看作是为达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其本身看成一项有特定意义的活动。同样，女权运动理论家也不去探讨政治生活的本质和女性的公民身份，而是把重点放在家务和生育等“女性价值”上。所以，尽管我们需要的证据大部分都已经收集到手，但大的轮廓还尚待拟订。

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 20 世纪 40 年代在书中称妇女为“历史力量”。要了解这股力量的经历，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政治和历史的传统舞台布局，把作为舞台背景和无人理睬道具的妇女历史搬到舞台中央。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视角，了解世界不仅只是通过前台的主要男性人物，而且还要通过女性人物，如清教徒的夫人、非洲奴隶、易洛魁主妇、女移民、贫民区社会改良团体的工作人员、秘书等。我们还需要了解一系列的情况，如中产阶级妇女和女季节工人的日常家务、家仆及工厂女工的日常工作、产妇的经历、婴儿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俱乐部的女性空间、慈善机构以及贫民区社会改良团体等等。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多种多样的故事是如何在历史上使社会和家庭生活相互影响和改变的，美国妇女的经历是如何主动地勾画出我们国家自己历史的大轮廓。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始想象作为公民的真正意义，才能全面参与决策过程，塑造我们的未来。

（杨俊峰 译）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美洲的第一代女性	(1)
第二章 来到北美的妇女：1607—1770	(17)
第三章 “我与政治有何相干”：独立战争时代	(43)
第四章 结盟的时代：1820—1845	(68)
第五章 分裂的时代：1845—1865	(99)
第六章 镀金时代的“母性共同体”：1865—1890	(131)
第七章 妇女与现代化进程：1890—1920	(161)
第八章 摩登女郎、弗洛伊德学说和爵士乐	(196)
第九章 幸免于经济大萧条	(222)
第十章 战争期间的女性——20 世纪 40 年代	(247)
第十一章 冷战与“女人的奥秘”	(274)
第十二章 发现的 10 年——“个人的生活具有 政治性”	(298)
第十三章 个人生活的政治化——妇女对妇女	(326)

第一章

美洲的第一代女性

根据易洛魁族人的传说，地球的形成是从一个女性下凡开始的，由于找不到落脚之处，她只好在海面上空盘旋。海里的鱼和其他动物见后对她非常热爱，便召开会议讨论应该由谁帮助她。乌龟献出它的硬背，形成了大地，下凡的女性在此安家。神灵见她很孤独，便与她生了三个孩子同她作伴。两个儿子的争吵至今仍然能在雷鸣时听到。女儿后来成了易洛魁族人的祖先。

在那些无疑是十分古老的土著神话和传说中，女性经常是中心人物。两万年以前，亚洲人跨越大陆桥，即今天的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大陆，北美大陆上的妇女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些当代土著美洲人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了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和生存条件，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文化。考古发现，两千年以前，一些北美土著人过着游牧生活，靠打猎和觅食生存；也有一些群居村落，靠驯化的植物和野生动植物为生；另有一些居住在较大的城镇，建立了复杂而有等级组织的社会。从考古遗物看，后两组已经形成广泛的贸易关系和宗教系统，把大陆广大地区的居民连在一起。当第一批欧洲人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到达北美大陆时，

土著人使用的语言已经有两千种左右，如此之多的文化种类使欧洲大陆文化显得十分单调。

采集食物、养育后代 交换物品、治病救人

无论北美各民族住在森林深处，河流两侧，还是平原的边缘地区，他们中的女性对这些部落的生存都举足轻重。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日常活动都是围绕寻找下一顿食物或下一个季节的食物而进行的。妇女采集、加工食品和养儿育女，这在全社区有目共睹，而且还对宗教仪式以及社区决议程序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

在多数印第安群体中，男女分工截然不同。妇女采集种子、根茎、水果和其他野生植物。在园艺部落，妇女种植玉米、豆角及南瓜等粮食作物。她们还负责做饭、保存食物、制作餐具和家具等。除此之外，她们还用泥土或树皮修建棚屋、圆锥型帐篷、物品储藏坑，制作长凳、垫子、木制搁物架和屠宰支撑架。在随季节迁移的部落里，妇女负责把所有家用物品搬运到新地点。

在许多部落里，男人主要从事打猎和打仗。猎物带回之后，剩下的活儿全部由女人承担：把鹿皮和野牛皮制成衣服、毯子、地板垫子、帐篷或可以交换的物品，保存食物、用动物骨头做些各种各样的工具等。

印第安各部落之间在男女分工方面也各不相同，有的部落比较灵活，有的部落比较严格。在一些部落，人们如果做不适合其性别的活计会遭到取笑和挖苦，而在另一些部落则

可以接受。有时男女从事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工作，例如：易洛魁族男人清理耕地，女人播种。在某些情况下，男女干的活相同，但在具体分工上又男女有别。例如：许多大平原印第安部落鞣皮子时就规定某些兽皮只能由女人来鞣，而另一些只能由男人来鞣。

这些区别不仅决定了女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在那些男女分工和生产合作形式十分明显的群体内，同性之间的团结得到加强。大平原印第安群体中的波尼族几个家庭同居一个大棚屋，约 50 人，妇女们一起参与做饭，住在南头和北头的实行轮流。在大平原印第安群体中的希达萨族，女性从事的活动按女性亲属家庭分工，男性从事的活动，无论是单个寻求神灵的启示还是参加集体狩猎队，都是按年龄和村落分工。女家庭成员修建房屋、采集种子和可食植物、种庄稼、收拾男人带回的猎物。

在易洛魁族群体中，男人长期在外，妇女有组织地进行农业生产。1758 年一位被塞内卡族（易洛魁族联盟的五大部落之一）收养的白人妇女对她们的田间劳动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夏季播种、照料并收割玉米，一般情况下，孩子们都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任何当头的监督或逼迫我们，所以我们是自由自在地在田间劳动。……我们的农活是按照印第安妇女的劳动方式进行的：为了使农活完成得更快，同时也为了作伴，她们都集中到一块大田里干活，或集中到一起做需要做的活。每年春季到来时，她们就为下一年选出一位能干的老妇当监工。老妇会接受这份荣誉，其他

妇女认为应该听她的。

到了播种季节，土地准备好之后，妇女们早上集合，到田间后每人种一垄，然后再到另外一块田里去播种，就这样一直把本部落的大田都种完。

妇女们在种植庄稼、制作工具、修建棚屋的同时，有些妇女还积极参与贸易活动。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的阿尔公金族妇女是最早和白人建立贸易往来的。1609年，亨利·赫得逊的大副约翰·裘艾特记录了发生在纽约港的一幕：“有28条满载男女和孩子的独木舟向我们划过来，他们想欺骗我们，可我们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没让他们上我们的船……他们带来的有牡蛎和豆角，我们每样都买了一些。”在后来的若干年里，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以下两点：妇女参与交易；在交易物品中女性感兴趣的物品占比例很高。居住在大西北阿拉斯加海岸上的特里吉特人以渔业为生，那里有丰富的大麻哈鱼渔业资源，可以用来和周边的部落进行交易。特里吉特妇女不仅负责把大麻哈鱼晒干并处理好，还管理家政，负责家庭财富分配。特里吉特妇女的交易技巧和精明的头脑经常让欧洲商人感到吃惊，她们会不时地上前干涉并阻止丈夫所进行的不明智的交易。在那种慷慨大方赠送礼物便能提高一个人地位的社会里，精明的交易往往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妇女在村里和部落里的权力和地位还来源于宗教神话和仪式，因为宗教神话和仪式象征性地反映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大多数北美印第安人的创始神话中，女性在超自然力量和大地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以农业为主的群体都举行仪式赞美大地母亲的季节力量——是大地母亲的身躯生产出玉米、豆角、南瓜等神圣食物。以打猎为生的民族更多

地把男性看成神圣力量的化身，但在有些情况下猎物的守护神是以女性出现的。当人类没有用适当的祷词和仪式向动物的神灵祈祷，没有用尊敬的态度对待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世界里的生灵时，她都能够观察到；她还能够惩罚人类，给人类带来疾病和饥荒。

美洲印第安人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神圣的、有生命的，生命存于万物之中，令人敬畏。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想通过得到神灵的启示来获得超自然的悟性和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段时间的隐居、绝食和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祈祷，女性的这种活动是在来月经期间进行的。

大多数群体都认为，妇女在来月经期间威力无比，能够毁掉庄稼或猎物，能够耗尽男人的精力。为了避免这一切发生，她们便躲在村外的月经茅屋里去。许多观察家认为，女性这么做是因为她们自己把来经看成是污染，是禁忌，躲到村外是对她们进行惩罚性的隔离。妇女自己这么认为吗？不然，她们很乐意短时间地离开家务活，享受其他女性的陪伴，能有机会沉思，净化灵魂，她们感到高兴。神灵的启示使一些妇女成了草药医生、接生婆、巫术婆和萨满教巫神。

婚姻的习惯做法在一些群体中使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在另一些群体中，婚姻都由长辈（通常是女性）安排，婚姻被视为建立经济联姻的一种手段。离婚如同家常便饭非常容易，女人只要离开丈夫就可以了。如果房子属于她，她可以说丈夫不能生育、通奸、懒惰、残忍、脾气暴躁或其他任何借口将他赶出去。妇女的人身自由还常常表现在性生活方面：尽管在那些男人占统治地位的部族里他们以女人的贞洁为荣，但大多数印第安部族对自己的性生活都不掩饰，也没有严格做到一夫一妻。女人在婚姻和性关系

方面的权力有可能取决于她和自己亲属关系的远近。

妇女的政治权力植根于亲属关系和经济地位。氏族规模和村落生活就意味着人们都通过亲属关系（如女儿、丈夫、舅父、祖母等）相互认识。在许多情况下，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当地的亲属氏族，在村落一级妇女的权力看上去很有可能是最突出的，而且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还有一些部落成立了公议坛（多数是暂时或临时的），如长老会等，涉及整个社区的利益问题都由他们拿主意。妇女在公议坛里占的比例极小，但人种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妇女在政治方面没有起过重要作用，但历史上却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女首领、女巫医和女商人。

女性的政治权力在易洛魁族妇女身上到达顶峰。土地全部归她们所有；她们合作种田，无论食物最初是由男人还是女人弄到的，分配权都由她们控制。这样，她们就控制了整个部落的经济体制，可以随时控制对家庭、长老会、斗士队或宗教庆祝活动的食品发放。易洛魁族人还把女性权力制度化，主妇（指德高望重的已婚妇女——译者注）有权提出长老会成员名单并有权罢免首领。正如一位传教士写的那样：“有必要的时候，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折断首领头上的角’（她们当时就是这么叫的），然后把他贬回到斗士的行列。首领的人选总是由她们首先提名。”长老会开会的时候，主妇会在长老们之间游说，说明她们的观点。尽管妇女手中没有正式权力，但作为家庭主妇，她们是以群体身份得到这种权力的。这同时也反映出她们在家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性别与变化：欧洲人的冲击

16世纪欧洲人开始入侵美洲大陆，印第安人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主要来自欧洲人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从欧洲带来的细菌和病毒。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种流行性疾病如伤寒、白喉、流感、麻疹、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天花、猩红热、链球菌、黄热病等使拥有2500万人口的墨西哥死亡率高达90%到95%。墨西哥北部地区的居民——这里后来成为美国领土——也遭受了类似的厄运。

随着文化、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不断接触，每个部族男女之间的区别也随之发生变化。有些妇女掌握了新的财权来源；有的却把自己的专长和权力两者都丧失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包括某些土著文化的男女分工、欧洲殖民者的人口组成以及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等。

例如：当阿兹台克（居住在墨西哥境内的北美印第安人——译者注）帝国被西班牙先进的军事技术战败后，女人成了战利品。密集的印第安人口和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西班牙征服者决定了西班牙男人与印第安女人之间持久的性结合。为了稳定自己的队伍，西班牙人不久便开始鼓励士兵与成为基督徒的印第安女人结婚。这些生下混血儿的印第安母亲在历史上被打上了背叛种族等级制度和与外族人通婚的烙印。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为后代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集基督教信仰、西班牙语和印第安人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于一身的文化。当代墨西哥文化就是从那时遗留下来的。

与之相比，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的英国殖民者携带妻室而至，很少和印第安人发生性关系。印第

安阿尔公金族妇女迅速抓住机会从欧洲人那里换来铁壶、工具、缝针之类的东西，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虽然她们很快掌握了欧洲技术，但印第安人积极反抗欧洲人的统治，她们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都给予还击。其中最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是印第安人仍然让妇女在政治、宗教仪式和交易场上出类露面，尽管英国人对此不赏识，也不愿意同她们进行交往。

欧洲人对内陆印第安人的冲击要间接得多。欧洲市场对皮货的需求给渴望得到欧洲货的部落带来了机遇，男人越来越注重狩猎和交战，这就使男女之间生活方式的界限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易洛魁族人很快对换来的货物产生了依赖感，丢掉了制造陶器、石斧、石刀和箭头的传统手艺。但是，到了17世纪40年代，他们猎光了自己的河狸资源，不得不和周边的部落争夺猎场。男人外出打猎的时间越来越长，村子成了女人的地盘。男人常年在外打猎、易货、交战，女人祖祖辈辈待在家里，建设家园。结果，在皮货贸易开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易洛魁族妇女对当地资源和事务有了更大的权力。

但在那些没有坚实农业基础的部落里，妇女的权力和影响就不如易洛魁族妇女大。居住在圣劳伦斯河上游河谷的印第安蒙塔内族人的经济重心转向依赖男人的收入上。在一些部落，一个女人已处理不完一个男人获取的猎物，一夫多妻现象多起来。

一些印第安女人——那些与皮货商通婚的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和经济模式。欧洲的皮货商——主要是法国人，后来又增加了英国人和荷兰人——几乎全部是男性，他们深入腹地数千英里后，基本生存和长期的贸易关系都要依